

# 重审“儿童之发现”：以 1920 年代的儿童报刊为中心

李煜哲

北京大学中文系

**摘要：**既有儿童文学研究一般将“五四”时期视为“儿童的发现”的起点，但这一观点值得重新审视。本文拟以 1920 年代的儿童报刊与儿童文学为主要的考察对象，从“儿童本位”观念对儿童文学的影响、儿童文学“童子军”背后的国族视野、儿童创作与成人话语的关系等角度，以求对“儿童之发现”问题进行重新梳理与审视。

**关键词：**儿童文学；儿童之发现；1920 年代儿童报刊

现有的儿童文学研究，一般都将“五四”时期视为“儿童的发现”的起点。茅盾的《关于“儿童文学”》一文，为这一观点奠定了基础。茅盾指出：“‘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sup>1</sup>王泉根在《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中，也以茅盾的这一说法为出发点，认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真正发现与发展，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的；在“五四”时期以“人的发展”、“人的解放”为核心的妇女解放、个性解放等诸多思潮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也肩负起了“儿童的解放”的使命，推动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的发现与发生<sup>2</sup>。然而，“儿童的解放”真的解放了儿童吗？在“五四”后所谓“儿童之发现”的话语中，实际上潜藏着哪些多样的面向？本文拟以 1920 年代的儿童报刊与儿童文学为主要的考察对象，对“儿童之发现”问题进行更为细致的梳理与审视。

## 一、“儿童本位”观念与儿童文学的兴起

1919 年，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来到中国，进行了为期两年又两个月的讲学，“儿童本位论”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sup>3</sup>。所谓“儿童本位论”，即儿童中心主义，针对的是传统教育中的非儿童中心倾向。在一次演讲中，杜威指出：“现代教育的新趋势，就是注重个人本能 Instinct 的趋势。从前的教育家对于儿童的本能，很不留意，现在才知道儿童的本能，是教育上很重要的东西。一切学问和训练，必定要拿人类天然的生来的本能做根据，利用他自动的能力，发展他原有的天性，才是新教育的宗旨。从前的教育，把学生当做被动的，把许多教授的材料装进学生心里去，就算了事；现在的教育，是要学生自动，是以学生个人的本

<sup>1</sup> 茅盾：《关于“儿童文学”》，《文学》第 4 卷第 2 号，1935 年 2 月 1 日。

<sup>2</sup> 参考王泉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重庆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13 页。

<sup>3</sup> 参考孙建江：《杜威“儿童本位论”及其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关系》，《云南社会科学》1995 年第 1 期。此外，根据学者王泉根的看法，儿童本位论最先由美国教育家杜威提出，并由杜威在 1919 年来华讲学时得到了系统的阐释，其主要内容就是反对传统教育视教师、教科书为中心。（参考王泉根著：《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重庆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4 页。）

能做主，拿教育做发展他们本能的工具。”<sup>4</sup>

这个观点对中国教育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20年10月26日，周作人在北京孔德学校作了“儿童的文学”演讲，系统地陈述了“儿童本位”观念。在这次演讲中，周作人指出：“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拏‘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几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那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sup>5</sup>周作人对于儿童个体的完满与独立性的强调，很快在文艺界与教育界工作者关于儿童的讨论中流行开来。例如，严济澄在1921年指出：“自从教育研究上有了儿童研究这一门以来，我们对于儿童本身的生活，渐渐地得到些正当的理解了。从前不承认儿童的生活是独立的，而以为他只是成人的预备；现在知道儿童的生活，也是独立的了。”<sup>6</sup>1922年，严济澄又一次对当时流行的教育观念进行了小结：“在现时流行的教育原理中，大家认为最重要的是两个根本思想，就是：一，教育要以受教的儿童做主体，做本位；二，教育是动的，不是呆板固定的，他的目的是转变的。”<sup>7</sup>

而“儿童文学”概念的产生，则与“儿童本位”的观念有着直接的关联。可以说，正是“儿童本位”的教育观念，让人们意识到了“儿童文学”的独立性：孩子的成长需要阅读，而在阅读的内容中，文学是非常重要的一类<sup>8</sup>。为此，搜寻、创作适宜给孩子阅读的文学作品被提上议事日程，“儿童文学”概念也应运而生，作为一个传统中国从未有过的文类而受到广泛的关注。1922年，《中华教育界》

<sup>4</sup> 涵庐记：《现代教育的趋势》，收入新学社编辑部印行：《杜威在华演讲集》，国光书局1919年版，第77-78页。关于杜威演讲的记录，有很多不同的版本。需要注意的是，杜威关注到新教育中“儿童的本能”的重视，并不是说新教育就不再把儿童视为成人社会的预备；通过恰当的教育帮助儿童更好地长大成人，本身就是教育的题中之义。杜威所强调的，在于过去的教育中往往过于关注儿童如何进入成人社会这一点，而对儿童自身的天性关注不足。在晨报社编辑的《杜威五大讲演》一书中，可以看到杜威的如下观点：首先，杜威指出，儿童的方面、将来儿童要进去做人的社会的方面、介乎二者之间的学校和教材三者都是教育要考虑的重要方面，其中第三点最为重要，“因为他（教育）的目的是要使儿童进到成人社会里面去”，而“教育学就是指挥他联络儿童与社会两方面使他成一个过渡的桥或摆渡船”；真正理想的教育，是要把以上三方面“调剂得宜”。其次，杜威由此批评过去教育方式的失败是把以上三方面“调剂不得其平”，尤其是“从前的人把介乎二者当中的学科看得太重、却把儿童与社会两方面看得太轻的流弊”。（参考杜威：《教育哲学》，收入杜威著：《杜威五大讲演》，晨报社1920年版，第134-135页。）在这里，杜威批评了过去的教育对于儿童自身和儿童如何进入社会两方面的忽视，因此杜威多次强调要重视儿童的天性，并且呼吁对儿童的实践教育，以与传统的知识灌输型教育相对抗。

<sup>5</sup> 周作人：《儿童的文学——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孔德学校所讲》，《新青年》1920年第8卷第4期，第54页。

<sup>6</sup> 严既澄：《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教育杂志》1921年第13卷第11期，第58页。

<sup>7</sup> 严既澄：《神仙在儿童读物上之位置》，《教育杂志》1922年第14卷第7期，第4页。

<sup>8</sup> 例如，周作人在孔德学校的演讲中，指出：“美国的斯喀特尔、麦克林托克诸人都有这样名称的书，说明文学在小学教育上的价值，他们以为儿童应该读文学的作品，不可单读那些商人杜撰的读本。读了读本，虽然说是识字了，却不能读书，因为没有读书的趣味。”（周作人：《儿童的文学——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孔德学校所讲》，《新青年》1920年第8卷第4期，第54页）叶圣陶在《文艺谈》中，指出：“他们（注：指儿童）对于文艺、文艺的灵魂——感情——极热望地要求，请愿相与融和混合为一体。从这一点，教育者可以得一个扼要的宗旨以为后来者造福，就是‘应当顺他们自然的要求，多多给他们以文艺品，做他们精神上的食料’。”（叶圣陶：《文艺谈·七》，1921.3.12发表于《晨报》副刊，转引自王泉根编：《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

上刊载了周邦道《儿童的文学之研究》一文，开篇即对儿童文学作出定义：儿童的文学即“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组成之文学，由儿童的感官，可以直接诉诸其精神的堂奥者”，“换言之：即明白浅近，饶有趣味，一方面投儿童心理之所好，一方面儿童可以自己欣赏的文学。”<sup>9</sup>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儿童文学读本教学法》。1923年，魏寿镛、周侯予合著的《儿童文学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探讨儿童文学原理的专著。全书分为六章，主要讨论了儿童文学的定义、儿童对文学的需要，以及儿童文学的要素、来源、分类、教学法等多个问题，对于当时既有的儿童文学研究进行了详尽的总结与讨论<sup>10</sup>。随后，又有了1924年朱鼎元的《儿童文学概论》，1928年张圣瑜的《儿童文学研究》等理论专著，丰富了儿童文学的理论讨论。

与“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相伴随的，是儿童文学报刊的发展。《儿童世界》、《小朋友》、《儿童画报》、《儿童文学》等，都是当时产生广泛影响的儿童刊物。1921年12月28日，郑振铎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儿童世界〉宣言》，表明《儿童世界》的创刊宗旨，就在于弥补以往注入式教育的不足：在旧教育中，刻板的教科书是儿童的唯一读物，儿童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读物。因此这个新的杂志将抱定三个宗旨：“（一）使他适宜于儿童的地方的及其本能的兴趣及爱好。（二）养成并且指导这种兴趣及爱好。（三）唤起儿童已失的兴趣与爱好。”<sup>11</sup>《儿童世界》周刊于1922年1月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杂志目录中标示出来的文学类型有诗歌、童话、“长编故事”、“亚拉伯故事”等，此外还有曲谱和“滑稽图画”。杂志博采国内外童话及故事素材进行重述与创作，带来了许多与传统蒙学教科书完全不同的、生动活泼的文学作品。

根据郑振铎在《〈儿童世界〉宣言》里的说法，这些文学作品主要取材自A. Mackenzie、Williston、Merrion、C. Baker、W. B. Yeats等人主编的杂志，以及格林童话、王尔德童话等，因为是儿童杂志，所以不大注出原著的书名和原著者的姓名。<sup>12</sup>这些文学作品以讲故事为主，虽然或有寓意，但于文字表面并不会刻意去揭示故事的意旨，儿童可以自己体会故事传达出的道理，也可以仅仅以读故事为乐趣。例如，第1卷第1期上刊登郑振铎翻译的童话《安乐王子》，原作者是王尔德，早在1909年，周作人在《域外小说集》中就以文言翻译过这篇作品。与周作人翻译的《安乐王子》相比，郑振铎的译本简写了一些内容，如开头人们对于安乐王子的评价，周作人直译了市参议员、母亲、路人、孤儿院孩子等对安乐王子的谈论，而郑振铎则只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些谈论，即“城里的人看见了这个像，都赞赏不置”<sup>13</sup>。由于开头和结尾的人物谈论有所呼应，这样简写

<sup>9</sup> 周邦道：《儿童的文学之研究》，《中华教育界》1922年第11卷第6期，第1页。

<sup>10</sup> 例如，其中对于儿童文学的定义是：“所以儿童文学，就是用儿童本位组成的文学，由儿童的感官，可以直接诉于他精神的堂奥的。换句话说：就是明白浅显，饶有趣味，一方面投儿童心理所好，一方面儿童可以自己欣赏的文学。”这个定义就采取了周邦道《儿童的文学之研究》的说法。

<sup>11</sup> 郑振铎：《〈儿童世界〉宣言》，原载1921年12月28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引用参考王泉根编：《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第66页。

<sup>12</sup> 郑振铎：《〈儿童世界〉宣言》，同前注，第67页。

<sup>13</sup> 《安乐王子》，《儿童世界》1922年第1卷第1期，第17页。

就能够省去开头和结尾一些情节性不强的内容,把童话的重点直接放在了安乐王子和小燕子之间的故事上,更有利于引起孩子的阅读兴趣。这篇童话后来被收入教科书,如在1928年的《新中华国语读本教授书》之“小学校高级用”第四册中就有《安乐王子》这一篇课文,编者不仅对童话进行了分节,并在每节课文后附有“事实的解释”、“文法及修辞”以及具体的教授方法,帮助并指导儿童理解与学习这篇课文。在第一节后的“教学事项”中,编者指出教学的要旨有二:“(甲)使儿童知道童话体记叙文的作法。(乙)引起对于人世种种忧患的同情心。”<sup>14</sup>相比之下,郑振铎在《儿童世界》中译介的《安乐王子》除了作出一些更适合儿童阅读的改动之外,既没有为童话作注解,也并未引导儿童去理解童话深层的思想内涵,只是以“燕子与按了王子从此就很快乐的住在天堂里”为童话作了一个简单而光明的收束。

《安乐王子》虽然只是《儿童世界》儿童作品的冰山一角,不过大体可以反映出在“儿童本位”观念影响下出现的儿童文学的一些特点:注重为儿童提供有趣味的、内容丰富生动的文学作品,而不是去对儿童展开道德教化,或是灌输不同学科的知识。关于不灌输学科知识这一点,还可以举出一例,即《儿童世界》第1卷第1期上的短篇童话《太阳,月亮,风的故事》。这篇故事讲述了太阳为什么很热、风为什么常常刮起沙尘、月亮为什么光芒柔和又皎洁,但其中的缘由完全是童话而非科学视角的:太阳和风因为在快乐时忘了自己的母亲而受到了母亲的惩罚,而月亮则因为自己快乐时不忘母亲而得到了奖赏,所以才有了它们现在的不同特点。可以看到,正如《儿童世界》的创刊宗旨所言,唤起儿童的兴趣是这些文学作品所主要考虑的。

然而,到了《儿童世界》第三卷时,情况则发生了一些变化。在1922年7月1日《儿童世界》第2卷第13期上,刊出了郑振铎的《〈儿童世界〉第三卷的本志》一文,提出《儿童世界》第三卷的编写方针将作出一些调整,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两点:第一,在“趣味”的涵养之外,注重“知识”的涵养,为此将加入自然科学和手工游戏的材料。第二,不仅供儿童“读”,而且要引导儿童去“做”,提升儿童的实践能力。此外,郑振铎还指出,《儿童世界》的目标是“本着我们的理想,种下新的形象,新的儿童生活的种子,在儿童乃至父母的心里”<sup>15</sup>。如果说《儿童世界》一开始是以儿童的兴趣为最为重要的考虑因素的话,那么到了《儿童世界》第三卷开始,在涵养儿童兴趣之外还使儿童扩宽知识面、提升实践能力,则成了这本杂志新的追求。在一定意义上,涵养儿童的兴趣是“儿童本位”的,是对真正的“儿童的发现”;而拓宽儿童知识面、提升儿童实践能力的希望,则更多地加入了成人启蒙的希冀。在郑振铎所谓“种下新的形象,新的儿童生活的种子”背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建设新国民的诉求——如此,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产生的改造国民精神的启蒙使命感呼之欲出。至此,“儿童本位”的

<sup>14</sup> 《安乐王子》,见方钦照,朱文叔,喻守真编:《新中华教科书 国语读本教授书 小学校高级用》第4册,新国民图书社1928年版,第177页。

<sup>15</sup> 郑振铎:《〈儿童世界〉第三卷的本志》,原载1922年7月1日《儿童世界》第2卷第13期,引自王泉根编:《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第70-71页。

“儿童之发现”，在随后日益强化的启蒙语境中，逐步被异化为一种国族视角的“儿童之发现”。

## 二、儿童文学中的“童子军”

在1924年4月15日出版的《儿童文学》杂志上，刊登了一则题为《童子军》的广告，鼓励儿童购买中华书局出版的《英国童子义勇团组织法》、《童子军组织法》、《童子军体操图说》三册书：“小朋友！你们要知道自己应该做的事业，自己应该求的知识和技能，只要入童子军。做了童子军，身体可以强健，思想可以周密，常识可以完备，动作可以敏捷，精神可以活泼，……你们要入童子军，必须购买中华书局出版的……”<sup>16</sup>

广告鼓励儿童积极加入童子军，并列举了做童子军的诸多益处。要理解《儿童文学》广告对于童子军的关注，在此需要简要梳理一下童子军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早在1911年春天，在上海已出现了由西人童子组成童子军<sup>17</sup>。1912年1月8日《申报》的“本埠新闻”栏目刊登了题为《童子军之精神》的报道：“住居顺征里南林里一带之各学堂，学生每日放学后聚集铁路旁边编成童子军一队，共有五六十人，年龄自十一二岁至十六七岁不等。所练体操，步伐整齐，精神贯注，队中教练员年亦相等，而能从容指挥，始终不懈，诚为难得。此足以见新国民之尚武精神矣。”<sup>18</sup>随后在1913年，湖北文华大学预科学校，以及上海的华童公学、青年会中学堂、圣约翰大学、浸会大学、圣约翰青年会、育才公学等纷纷组建童子军。同年，时任上海格致中学校长康普发起召集童子军教育会议，邀请教育界人士及热心童子军者共同讨论适于中国儿童的组织与训练方法。1915年，中华全国童子军协会成立，童子军也渐渐在全国其他地方推广开来<sup>19</sup>。

在同年上海举办的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上，童子军的联合会操得到了时人的关注与称赞。人们认为童子军有助于培养儿童的高尚精神，如《少年杂志》记者在题为《童子军》的报道中就向儿童发出了热切的召唤：“但愿中国全国的小学生，多编入童子军。有了尚武精神，方算得是个军国民。”<sup>20</sup>启蒙者在“童子军”这个群体身上寄托了对于新国民的期待，如孙培年的《论童子军》一文，将中国儿童与外国儿童相对比，强调童子军的重要性：

我国童子既入学，与读书识字为第一义，其他勿问也；外国则并重体育，以事锻炼。是以我国童子甚拘谨，拘谨则身病；外国童子极活泼，活泼则体强。东西各国，训练童子有辅助军队之能，年虽未冠，动作悉如成人，即今所号为童子军者是也。童子军关系于一国也甚巨，两军巨战，用以传通消息，转运军需，或看护伤兵，保护电线铁道，全军安危，多系其手。自千年欧战发生，各国童子军

<sup>16</sup> 上海儿童文学月刊社：《儿童文学》，1924年第1卷第1期，第31页。

<sup>17</sup> 关于童子军在中国的起源问题，存在一些争议，孙玉芹在其专著《民国时期的童子军研究》一书的第三章中有详细的史料考据与辨析。此处取孙玉芹说法，参考孙玉芹著：《民国时期的童子军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页。

<sup>18</sup> 《童子军之精神》，《申报》1912年1月8日，第二张第二版。

<sup>19</sup> 参考孙玉芹著：《民国时期的童子军研究》，同上注，附录8《童子军大事年表》，第315-317页。

<sup>20</sup> 本报记者：《童子军》，《少年杂志》，1915年第5卷第8期，“新闻话”栏目第3页。

皆能为国尽力，可敬孰甚。我国近年亦有童子军之编练，异日强国强兵，以老大之中国，一转而为少年之中国，凌欧驾美，为国增辉，童子军之建绩，顾不伟欤？

21

把童子军视为建设“少年之中国”的重要途径，从近处来看是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局的刺激，而从远处来看也是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战争中屡次失败的情形下，急于强国强兵的心态的结果。在这段论述中，作者强调儿童受过类似军队的训练后，能够“动作悉如成人”——通过军事训练使儿童迅速成人化，从而能够在真正的战争中承担特定的职责，正是童子军的目的所在。童子军标示出“成人”与“国族”两种话语对儿童的介入，而二者都并非“儿童本位”的。

1924年3月，江苏省教育厅准将童子军列入中学必修课程<sup>22</sup>。而先前提到的中华书局出版的三本书《英国童子义勇团组织法》、《童子军组织法》、《童子军体操图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随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世界》杂志在1924年8月9日出版的第11卷第6期上刊登了一则启示，预告了《儿童世界》接下来内容上的变更，即新增一个栏目“童子军”<sup>23</sup>。在接下来的第8期上，刊登了《童子军宣言》一文，号召儿童加入童子军，并宣扬加入童子军的益处：“给你们正当的生活，锻炼你们的身心。养成一个有道德，有智识，有能力，将来为国家，为人群造幸福的人。”<sup>24</sup>而该杂志增设“童子军”栏目的目的，则是“造成一个大树林，给看官们读了，好像坐在一个绿林的当中，有游戏，有唱歌，有故事，以及种种生活的快乐”，“并实行‘仁智勇’三字，去发扬童子军的真精神”<sup>25</sup>。

需要看到的是，《儿童世界》作为一个儿童阅读刊物对于“童子军”的关注，与人们对作为社会组织的“童子军”的关注是存在差异的：前者重在提供关于童子军的知识，并藉此发扬童子军的“仁智勇”精神；而后者重在通过童子军的形式提升儿童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并通过军队性的管理和训练把儿童纳入为社会变革和建设的可动员力量。这种侧重点的不同，使得《儿童世界》对于童子军的叙述方式也与其他报刊有所区隔。例如，在《儿童世界》第11卷第8期上，有《童子军的来源》一文，对世界和中国童子军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简单的梳理。这篇文章以对话的形式展开，通过一个五岁的孩子和他的爸爸一问一答，展现一部生动活泼的童子军简史。文章中关于童子军发展的时间、地点、数量等信息都是模糊的，如开篇即以“从前有一个时候”来叙述童子军的起源；再如当孩子问及爸爸中国的童子军数量有多少时，爸爸用“很多很多”来答复他。如果将此文与1929年《星期评论》上发表的《中国童子军概况》一文进行对比，就能发现《童子军的来源》这种通过设定一个情境，以讲故事的方式呈现童子军历史的文学性

<sup>21</sup> 孙培年：《论童子军》，《少年杂志》，1917年第7卷第6期，第8-9页。

<sup>22</sup> 参考孙玉芹著：《民国时期的童子军研究》，同上注，附录8《童子军大事年表》，第319页。

<sup>23</sup> 儿童世界社：《启示》，见《儿童世界》1924年第11卷第6期，第6页。

<sup>24</sup> 儿童世界社：《宣言》，见《儿童世界》1924年第11卷第8期，第36页。

<sup>25</sup> 儿童世界社：《宣言》，同前注，第37页。

文风，与《中国童子军概况》之严谨客观的历史叙述，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在文学的世界里，“儿童”是笼罩在“童子军”之上的；换言之，“童子军”在一定意义上只是文学要处理的一个对象，是文学在发挥对儿童的教育作用时所利用的一个素材而已。童子军的社会组织功用儿童文学报刊这样的传播媒介中被弱化，《儿童世界》主要通过强调童子军的精神，来改造儿童的精神，培育儿童的良好道德。

由此，《儿童世界》这样的“童子军”的叙述主要是服从于“儿童”，而非服从于社会和国家。原本并非“儿童本位”的“成人”和“国族”二元话语在“童子军”这样的组织形式中对儿童主体的侵入，却在文学的领域中被消解，“儿童本位”在这里又浮出了水面。但换个角度来看，当儿童文学利用“童子军”这样的社会资源来培养儿童的良好精神和道德，又何尝不是为了培育出建构未来理想社会的新国民呢？因此，文学中的“童子军”叙述所体现出的“儿童本位”，与1920年周作人引进西方教育学观点而提出的把儿童视为一个自足主体的“儿童本位”是不同的：前者尽管让“儿童”笼罩在了其他话语之上，但“儿童”已经与国族话语紧密纠缠在了一起。如果说最初的“儿童本位”观中，儿童是作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人”被发现的，那么后来的“儿童本位”中，儿童则日渐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人”而被叙述。在1924年的《儿童文学》上登载有一首《进行曲》，歌词写道：“我们努力向前行，愿替同胞作先驱，爬上高山涉遍谁，幸福未得永不回。”<sup>26</sup>这种自觉担负社会责任的主人公意识，在日后抗战时期的儿童文学中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发展<sup>27</sup>。

### 三、儿童创作：“小朋友”与新少年

无论是成人话语还是国族话语，上面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文学对儿童的一种规范。那么，儿童是如何对文学作出反应的呢？要明白这个问题，就需要从文学接受者的角度，通过儿童创作来一探究竟。在“五四”后的中国，所谓“儿童的发现”其实是成人对于儿童的一种发现；而在此之前，儿童并未被视为独立自足的个体，儿童时期的天性和兴趣被忽视，从孩子小时候起就努力培养孩子的智识是儿童教育的主要诉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儿童也自觉以成人的希望来要求自己，从而自己将自己纳入到成人与国族的双重话语中。

能够在直接反映这一状况的，是“五四”以前报刊上所登载的儿童创作。1914年，《中华童子界》杂志创刊，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在创刊号上，有《中华童子界发刊辞》一文，指出该刊有“促进诸君之品行学问”的作用，并且以其“含蓄较广，变化较多”的特点而能“补助学校家庭之不足”<sup>28</sup>。可以看到，

<sup>26</sup> Bizet 原曲，谢六逸作歌：《进行曲》，《儿童文学》1924年第1卷第3期，第1页。

<sup>27</sup> 关于这个话题，可以参考徐兰君著：《儿童与战争：国族、教育及大众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作者在书中指出，儿童写作是抗战时普遍的文化现象，当时的儿童书局出版了一系列由儿童写作的书籍，这些儿童写作者通常会被贴上“小工人”、“小农民”等阶级身份标签，儿童不再如20年代冰心《寄小读者》那样作为“小读者”被构建，而是作为战争经验的写作者被召唤（见该书第三章，第89页）。

<sup>28</sup> 本社编者：《中华童子界发刊辞》，《中华童子界》1914年第1号，第2页。

培育儿童的智识和品德是《中华童子界》的主要目的，这就与后来以发现、培养儿童兴趣为宗旨的《儿童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是成人与社会对儿童的规训，而后者则是成人对儿童主体性的迎合。《中华童子界》上刊登了不少文学作品，并且设立“童子俱乐部”一栏，一方面出题悬赏，吸引儿童购买该刊，另一方面也从第2号开始在“童子俱乐部”内增设“读者成绩”一栏，广泛征集儿童自己创作的文学、绘画、书法作品。在创刊号“童子俱乐部”栏最末的《附告》中，编者提及投稿要求：“诸君如有平日之作文习字图画等成绩，不限格式，均可投寄，惟须注明姓名年龄及某校第几年级生，本社当择优登载，入选者酌赠书籍。”<sup>29</sup>

这则《附告》提示出如下几点：第一，所征稿件是儿童平时在学校里完成的作品，是他们日常所受的教育的产品；第二，编者要求投稿者注明自己的姓名、年龄、学校和年级，显示出个体的儿童作为独立的作者得到重视——儿童“小作者”的身份，在此已经得到了大众传媒的发现与鼓励。然而，虽然儿童的主体地位在形式上似乎已经被确认，但儿童思想上的主体性却是存疑的。在1914年第2号上，发表有两名长沙师范附属小学第三年生所写的日记。一则日记写道：“昨日中元，接祖宗期也，学友请假者甚多。吾意祖宗有灵，必望子孙读书自立，何至一归家中，使小孙儿游戏其旁，以虚废光阴也？请假在家祭祖者，祖必不领受。”<sup>30</sup>再看另一则日记：“下午余与妹出外闲游，有军队过，吹号持枪，整队而行，状甚威武。妹惧欲逃，余止之曰：‘勿惧，此我国军队也。’妹曰：‘我国何为设此军队？’余曰：‘军队能卫我国民，能张我国势，实立国之根本也。故军队所至，无人不尊敬之。’”<sup>31</sup>

上面两则日记，恰好分别指向了两种话语：前一则日记中，成人对儿童的勤学劝诫被儿童内化为对自我的要求，指向的是成人话语；后一则日记中，儿童对军队与国势之关系这样的社会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指向的是国族话语。在这两则儿童自创的文学作品中，无论是成人话语还是国族话语，都并非外界所强加于儿童，而是被儿童充分消化并自我认同的。然而，需要看到的是，日记作为一个具有很强私密性的体裁，应当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内心；但当私密性的日记作为文章被发表出来，这种日记对个体内心的忠实度就并不那么可靠了。因此，两则日记看似自觉的成人与国族话语体认，也可能是儿童对报刊偏好进行迎合的结果。在《中华童子界》上，还有许多这样的文学作品，我们从标题就可以管窥一二：《保护名誉当如保护财产论》<sup>32</sup>、《求学宜勤说》<sup>33</sup>、《体育与德育智育并重说》<sup>34</sup>，等等。对于儿童而言，这些思考是他们日常学习生活中所经常要进行的；此类议论性文风中对国家、社会的关注显示出，这些儿童在自觉地向成人世界与更加宽广的社会进军。

<sup>29</sup> 本社编者：《附告》，《中华童子界》1914年第1号，第79页。

<sup>30</sup> 张佑德：《学生日记》，《中华童子界》第2号，第59页。

<sup>31</sup> 曾敬典：《学生日记》，《中华童子界》第2号，第59-60页。

<sup>32</sup> 见《中华童子界》1914年第3号，第60页。

<sup>33</sup> 见《中华童子界》1914年第4号，第59页；第6号，第57页。

<sup>34</sup> 见《中华童子界》1915年第7号，第77-80页。



1922 年创刊的《儿童世界》从第 2 卷起出现了“儿童创作”类别，选登优秀儿童作品，与《中华童子界》的“读者成绩”类似。不过就文学作品来看，与《中华童子界》相比，《儿童世界》的儿童文学作品无论是风格还是内容，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华童子界》上议论文占大多数，此外还有少数写景状物的记叙文；而《儿童世界》之“儿童创作”下的文学作品类型，则有童话、小说、（诗）歌、杂文、故事、短剧等<sup>35</sup>，基本上都是讲故事而少有议论。例如，一个十二岁上初等四年级的小朋友，在第 2 卷第 3 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狮，虎和狗》的短篇童话，讲了一个很简单故事：狮、虎和狗三只野兽结为兄弟，每天轮流出去打猎，回来一起吃。有一天狗无果而归，虎因为太饿所以把狗吃了，而狮也因为太饿于是把虎吃了。第四天狮出去打猎，发现野兽都被山火烧死了，它因此找不到猎物，于是也饿死了。<sup>36</sup>故事讲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全文都只是平淡地叙述，没有任何议论性的文字。小作者自己可能也不是很明白故事的深层寓意，但当这篇文字出现在报刊上并被更多的小读者所阅读时，每个小读者都可能以自己的方式照亮故事的某一个维度，从而大大地激活了故事的内在的生成性。而这样的故事，是如何被一个十二岁的小朋友所生产出来的呢？可以看到，《狮，虎，和狗》这篇童话，与《儿童世界》上的其他作品风格也是非常相近的。如果我们拿这篇儿童自创童话与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安乐王子》相比，可以发现，《狮，虎，和狗》也采用了类似的回环往复的结构，不变换故事的叙述方式，只变换故事中的行动主体，由此生成一个新的原创故事。至此，激发儿童文学创作的资源，不再是他们的学校教育，而是儿童读物所提供的文学作品本身。

在 1922 年《儿童世界》第 2 卷第 7 期上，发表有一篇体裁定为“杂文”的文章《图画的好处》。从标题上看，这似乎是一篇议论性的文字，但这篇文章实际上完全没有采取议论文的作法。小作者通过叙述一个故事，来说明“图画的好处”：

一朵菊花，对着我，他用很美丽的样子朝着我笑，我很喜欢他，他跟我和好朋友一样，过了数天，他就死了，他死的时候，好像对我说，“下会再见吧？”这时候我很冷静，后来他又来了，我便照着他的样子，画了一个下来；他死了，我想起他，就拿出来看看；这时我便不像上会那么冷静了。

这便是图画的好处！要是不会画，不冷静了么？<sup>37</sup>

这篇文章语言朴实，但运思却十分巧妙。这种人与花朵之间的深厚感情，正是童心所特有的对于世界的感受力。小作者的文句和逻辑有的地方并不通畅，比如“后来他又来了”一句在成人眼里就显得很奇怪，一朵死去的花儿怎么会“又来了”呢？更何况，既然已经死去，就算重新开了一朵菊花，也不是之前和小作者是“好朋友一样”的那朵菊花了。然而，在这个五年级的小朋友心里，这些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画了画与没画画的区别：有了小菊花的图画，“我”在想起它的时候就可以看看画，以重温过去“我”与这朵花儿的感情。在 1920 年《儿

<sup>35</sup> 见《儿童世界》第 2 卷第 3 期起目录中“儿童创作”栏下的作品，每个作品标题后会有括号标明文类。

<sup>36</sup> （毓贤学校初等四年级）郑喜元：《狮，虎，和狗》，《儿童世界》1922 年第 2 卷第 3 期，第 18 页。

<sup>37</sup> （北京孔德学校国民五年级）瞿世荃：《图画的好处》，《儿童世界》1922 年第 2 卷第 7 期，第 25 页。

童的文学》演讲中，周作人指出：“儿童没有一个不是拜物教的，他相信草木能思想，猫狗能说话，正是当然的事；我们要纠正他，说草木是植物猫狗是动物，不会思想或说话，这事不但没有什么益处，反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使他们的生活受了伤了。”<sup>38</sup>《图画的好处》这篇作品，正是儿童“拜物教”心理特点的生动呈现。更为重要的是，《儿童世界》的编者并没有去对这种“拜物教”进行修正，而是将儿童“我手写我口”的文字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来。

在同样于1922年创刊的儿童杂志《小朋友》中，从第1卷第5期开始设有“小朋友俱乐部”一栏，刊载儿童来稿与通信。编者对儿童来稿的希望是，“无论诗，歌，故事……等，最好不要经过成人的修改；若是经过老师和尊长们修改过的稿子，就请把原稿和誊正的稿一并寄下”。而对于来稿，编辑们承诺：“来稿如果合用，一律照登，不删去，不增加，不改动，让他的真面目表露出来，以便小朋友们互相批评，订正。”<sup>39</sup>可以看到，对儿童作品原貌的保留，是这些新时代的儿童文学杂志的共同特点。当儿童本体的兴趣被关注，儿童作为独立自足的主体得到充分的尊重，儿童之为儿童的活力就被大大地激发了出来。自觉被成人规训、自视为社会主人公的希冀快速成长的“新少年”，在“儿童本位”观指导下的新儿童读物的引领下，回返为最大限度地葆有童真童趣的“小朋友”——而这，正是持“儿童本位”教育观的启蒙者们所期待的“儿童之发现”。

#### 四、余论

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儿童之发现”一章中指出，正如“风景”是在明治20年代由一直拒绝外界具有“内面性”的文学家们所发现的一样，“儿童”也是一种“风景”，是由成人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而发现的<sup>40</sup>。的确，在1920年代，在“儿童本位”的教育观影响下而产生的以儿童为中心，希望发现、培养与迎合儿童的兴趣爱好的儿童文学，其实并未摆脱成人话语，而恰恰是经由成人反观自身时所开辟的天地。在某种程度上，儿童文学中寄寓着成人对童年最美好的想象，是一个“美丽的童话的人生”<sup>41</sup>。而随着现代中国政治格局的不断复杂化，儿童文学也日益被卷入到国族话语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儿童文学就是儿童话语与国族话语紧密缠绕的最好例证<sup>42</sup>。可以说，最初以“儿童”为核心的“儿童之发现”，其实从一开始就内蕴着一种非儿童性：无论是成人话语还是国族话语，都作为一种潜在的力量，牵扯着儿童文学流溢出“儿童本位”的初衷，实用性、

<sup>38</sup> 周作人：《儿童的文学——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孔德学校所讲》，《新青年》1920年第8卷第4期，第55页。

<sup>39</sup> 《小朋友俱乐部》，《小朋友》1922年第1卷第5期，第28页。

<sup>40</sup> 参考（日）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五章“儿童之发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2页。

<sup>41</sup> 1923年，《文学周报》刊登了郑振铎的《〈稻草人〉序》，对于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进行了评价，认为叶圣陶早期童话“梦想一个美丽的童话的人生”。（郑振铎：《〈稻草人〉序》，文学周报第29期，1923.10.15，第1-2页。）

<sup>42</sup>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抗战时期的儿童文学内部其实仍然是非常复杂、具有多个面向的，并不能笼统地以为抗战时期的儿童文学就完全失去了1920年代早期儿童文学中得到较大发展的那种美丽、纯真的童话气质。但限于本文有限的篇幅，无法对抗战时期的儿童文学进行充分展开，有关这个话题的相关内容可详参徐兰君著：《儿童与战争：国族、教育及大众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功利性的追求始终与无功利的“兴趣”性追求相伴相随。

（作者简介：李煜哲，女，（1995—），汉族，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